

朱熹被骗做广告

现代社会,利用名人给自己的产品代言做广告非常普遍。而在古代,商家也早就学会了利用名人的社会效应。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一次得了脚病,平日出门得靠一根竹杖,走得也很痛苦。几年下来,这脚疼的毛病让朱熹心力交瘁,苦不堪言。

一个江湖游医听说了此事,说用他的祖传药膏配合针疗就能把朱熹的脚病医好。果然,游医给朱熹的脚上涂了些药膏,又用“针熨疗法”弄了弄,朱熹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游医说他这针疗加涂药乃祖上秘方,保准他几天后下地行走如飞,并许诺医好朱熹的脚病分文不收,只求朱熹给他写一首诗宣传宣传。

朱熹很高兴,给了游医些钱,又为他写了首诗,称赞他医术高明:“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以前勃窣翁。”意思是脚痛了几年,只得拄着竹杖走路,如今一针病好,出门时,小孩们都笑了,说这回可不像从前的跛子老头了。可是,没过两天,脚比以前痛得还厉害,“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朱熹这下才发觉上当受骗,急忙派人去寻找游医,而游医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下朱熹后悔不迭,逢人就说自己上当受骗的事,告诫人们切不可轻信那些打着名人招牌招摇撞骗的人。据《羊城晚报》

东汉光武帝爱才助其成功

东汉光武帝刘秀不仅从血缘上继承了刘邦的政治家风采,还从事业发展上继承了刘邦的正统遗产。“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成为指导刘秀举兵、定国、建业的根本方针。

刘秀参加起义队伍后,对全国各地的英俊豪杰招徕,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才聚拢到自己队伍中,为他问鼎天下奠定基础。

当时都护将军贾复在征战中受伤,以为不治,刘秀当即表示:我听说贾复的妻子有孕,如果生的是女儿,我儿子娶她;如果生的是男孩,我把女儿嫁到他家。后来贾复康复,非常感激刘秀。

右大将军李忠的母亲和妻子被叛将马宠拘捕,马宠以此要挟李忠投降。李忠毫不犹豫地斩杀了在其队伍中任职的马宠的弟弟,以此表明对刘秀的忠诚。刘秀深为感动,命人救助,确保了李忠家属的安全。

名士严光小时候与刘秀一起读过书,上过学,很有才华,后来隐居起来。刘秀当了皇帝后,思慕其贤,图画其像,派人按图寻找。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严光。刘秀准备好车辆,“遣使聘请”。为了表示诚意,刘秀亲登严光之门,严光假寐以拒刘秀,刘秀不但不生气,还苦苦相劝。严光不为所动。刘秀“升舆”,“叹息而去”。在宫中的刘秀,非常想念严光,“复兴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刘秀打算提拔严光为谏议大夫,但是遭到严光拒绝。严光后来隐居富春山。等到严光去世后,刘秀非常感伤,“赐钱百万,穀千斛”。

刘秀尊贤访贤的名声传播开来,让更多的有真才实学的人看到了希望,促使他们走出书斋,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据《学习时报》

乾隆皇帝爱植树

清朝定都北京后,很重视植树,护河堤,防风沙。乾隆皇帝更是身体力行,倡导植树造林。他曾多次巡查京城的树木种植情况,出台了很很多植树奖惩措施,还写下了一些有关植树的诗。

永定河位于北京的西南部,海河五大支流之一,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历史上常有水患。清政府在加大河道治理的同时,在大堤上广植柳树,保持水土,以防溃堤。

为鼓励永定河沿岸村庄的民众在清明节期间广泛植树,清政府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每户植树五十株以上者,予以奖励;百株以上者,另外加奖;千株以上者,予以重奖。在植树成活率及养护管理方面,乾隆时期对地

方官有明确要求:“仪、行树(道路树木)株,三年限外,仪树每千株回干(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议,十株以上,降一级留任;行树每千株回干不及五株者,免议,五株以上,相关官员罚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罚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级留用。其仪树每千株回干至一百株以上,行树每千株回干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员降一级调用,并将该管大臣罚俸一年。”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又一次巡视永定河堤防时,写成一首五言诗,总结了植树经验和柳树护堤的作用。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

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柳树生长快,树根纵横交错,盘结固堤,并且在抗洪抢险期间,可以随地砍伐柳树应急,迅速省时。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乾隆植树碑一通,正面刻有乾隆御笔题写的《种松诗》一首:“清明时节宜种树,拱把稚松培植看。欲速成非关插柳,挹清芬亦异滋兰。育材自合求贞干,絮矩因之思任官。待百十年诤云远,童童应备后人观。”落款为:“种松戏题,丁未仲春中浣御笔。”此碑原为圆明园遗物,圆明园焚毁后移至未名湖畔。

乾隆在诗中以植树比喻做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解释说种松树二三十年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成林遮荫。做官和种树一样,不能立竿见影,马上见到成效,也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

据《北京日报》

胡适资助林语堂

被称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生爱才,用自己的工资帮助过许多读书人。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留学期间,经费用尽,生活断炊。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助于北大任职的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回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

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哪两千块钱?”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且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

据《甘肃日报》

石勒:曾卖身为奴的皇帝



石勒

西晋末年,汉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在同一年分别建立了成汉和汉赵政权,开启了十六国政权林立的年代。在此之后匈奴人石勒建国号为赵,自称赵王,其政权史称后赵。

他出身底层,曾经到过快要饿死的地步。在魏晋那个特别重视门阀等级的年代,贫寒之士要想爬到社会的高层,是难乎其难的,开国之主中出身下层的仅石勒一人。

史载石勒为“上党武乡羯人”“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其父亲只是一名“部落小卒”,后来父亲从小卒熬到了下层军官,由于性格粗犷,没威信,常常委托石勒帮着带兵,这给了他锻炼的机会。少年石勒便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部胡爱信之”。

后来家乡发生大饥荒,他带的胡兵也散了,在投靠无门时路遇叫作郭敬的乡邻,向他哭诉自己又饥又冷,郭敬便给他食品衣物。为感谢郭敬,石勒给他出主意:这样下去都会饿死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你不如召了来,再把我们卖到赵地,你赚了钱我们也活了命,两全其美。郭敬答应了,便哄来一批人,说卖往山东从军,路上很苦,“两胡一枷”,饥寒死者众多。石勒活下来了,卖给一家人做奴隶,后来被主人免去奴隶身份,以相马为业。他生活漂泊不定,便邀集“八骑”上山当了强盗,后来增加到“十八骑”,由此而起。

据《学习时报》

钱钟书读字典

据《钱钟书传》介绍,钱钟书有读字典的习惯,而且自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在一次车船劳顿中,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同行的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英文字典在读。这位友人大为不解地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不愿废时劳神地去查字典。”钱钟书略带揶揄地说:“字典是旅途的良伴……你这种不求其解的态度不能用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一席话,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感佩。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齐襄公:一颗甜瓜酿政变

在齐桓公成为霸主之前,他的哥哥齐襄公,竟然因为甜瓜导致齐国内乱。

连称、管至父两位大夫在葵丘这个地方戍边,按照那时的规矩,戍边的将领应该是一年一换。他们在出发前见过国君,那时候齐襄公正在吃甜瓜,想都没想就说,来年瓜熟的时候我就派人把你们替回来。

等到来年瓜终于熟了,两位将领等了几天发现国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他们以为国君忘了,于是派人带着两车瓜送给国君,借此让国君想起来他俩还在葵丘呢。没想到,齐襄公瓜也吃了,人也夸了,就是不提换岗的事。在别人的提醒下,齐襄公除了说了些空话,还让他们继续在边境种瓜。

远在葵丘的那两位彻底绝望了,随决定起兵谋反,回国杀死了齐襄公。

据《北京晚报》

名人小事

陈云: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1937年至1944年,陈云担任了7年的中央组织部长。在离任之际,继任者彭真及其他一些同志问陈云,有没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对此,陈云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了明确回答。他说,7年中看到了一种不良倾向,“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他的交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要正确看待功劳,要摆正个人位置。

傅英豪:土办法解决音响回响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之前,曾遇到过过一个难题:会场的回响。军委通信部试尽了各种办法,但仍然消除不了。午饭闲聊时,不知是谁谈起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时,说了一句:“化整为零。”傅英豪听到这句话后有了主意。他将怀仁堂分为相等的9等份,每一份吊一个喇叭。由于人的听觉构造是接受前面传来的声音,而声音不是直接通过空气,而是几经反射传到人的耳朵里。因此傅英豪则有意违背人的生理构造,使回音不能完全进入耳郭。加上人本身就是吸音体,地上又铺有地毯,故从高处下来的声音只能激起很弱的回音。9个喇叭全部安装完毕后,怀仁堂的音响回响问题就解决了。据《天津日报》

张之洞的清廉官德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便将几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据说他死后,家中“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口几无以为生”,甚至他的丧葬费,多数是亲友和门生资助的。

并不是张之洞没机会聚敛财富。张之洞一生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但他能把住贪念,欲望的闸门,恪守清廉的为官之道。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关上门在两广总督衙门中过,有商人预先知道,“滕爆竹三万”前往祝贺,谁知他大门紧闭,谢绝纳客,商人只好将鞭炮带回自家燃放,被传为笑谈。曾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下:“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张之洞当皮箱过年的故事”。武昌一些大当铺见是总督衙门拿来的皮箱,信誓有保障,也不开箱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每只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开春后手头宽松了,张之洞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团结报》